

# 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回归

## ——《福楼拜的鹦鹉》中行动与动机关系的弱化

王玉芒 谭 敏

**摘要:**当前对《福楼拜的鹦鹉》的研究多借助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较少旁及其他角度。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的相关理论及尼采有关“记忆”的观点来弥合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福楼拜的鹦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产生的代际裂隙。具体来讲,小说实际上是依托后现代主义语境指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议题——小说主人公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这一点在作品的双重叙事结构(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中均有体现。它使文本兼具虚构和真实两种属性,叙述者的感情也被悬置于某种无所归属的“中间状态”。两者之间关系弱化的重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在表层叙事还是在深层叙事中,叙述者面对复杂的符号体系时都无法拣择行动与动机之间介入的大量记忆。小说揭示了行动在记忆的干扰下所具有的可能性,行动不一定必然与动机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讲,《福楼拜的鹦鹉》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向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归。由此本文揭示出小说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关键词:**《福楼拜的鹦鹉》;行动;动机;弱化;记忆;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4

DOI: 10.12002/j.bisu.2016.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2-0093-12

### 引言

对传记的传统叙事模式的质疑使《福楼拜的鹦鹉》显现出特立独行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种质疑同时存在于文本内外。文本外,巴恩斯直言:“传统的、学究式的传记写作方式——搜求文献,筛选材料……这种方法已经过时”(Barnes, 1982: 22)。文本内,叙述者杰弗里·布雷斯韦特自问道:“为什么作品总是促使我们追逐作家?……可是我们仍旧不听劝说,一味去追索……”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以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1. 天津市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实·现代·后现代:朱利安·巴恩斯的创作风格研究”(项目编号:TJWW13-038);2. 中国民航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拜伦叙事诗中的他者与崇高性”(项目编号:ZXH2012F006)。

一块布片和一绺头发等等”（3）<sup>①</sup>。巴恩斯在另一部作品里直接回答了布雷斯特韦特的问题：“传记与收集作者的头发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加高级”（Barnes, 1985: 16-17）。在《福楼拜的鹦鹉》里，线性叙事结构、文本权威等传统叙事要素境地尴尬，以至于连这部作品的文体分类都引发了争论。传统叙事模式被不可靠叙事、表层叙事结构下精心伪装的真实叙事、自我否定、身份的悬空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策略所取代。然而，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策略是飘浮在文本内的，将其托起的却是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的重要主题，即小说中主人公的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就形式而言，这种弱化使《福楼拜的鹦鹉》兼具虚构和真实两种属性；从内容上来说，它将主人公的感情悬置于一种无所归属的“中间状态”（limbo），由此导致了他的自我欺骗和不可靠叙述。究其原因，叙述者深陷由个体历史和对福楼拜作品的探求这两者交织而成的符号之网，他无法通过拣择记忆对复杂的符号体系加以简化。正是这种无差别涌现出来的记忆弱化了行动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 一、弱化的表现：双重叙事结构与整体性

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具有理智的推理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行动，其行动和动机之间有着清晰的脉络和联系。现代主义文学一反现实主义对人物描写的做法，它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内在精神活动、行动的匮乏与荒诞。亨利·詹姆斯倡导心理现实主义，即直接呈现人物主观真实的透视方法。在《鸽翼》中，詹姆斯实践了“通过人物意识、人物观察来展示故事事件的‘图画法’模式”（申丹，2013: 115）。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全知叙述模式不同，詹姆斯所提倡的“图画法”模式“侧重的是人物内心意识，因而缺少传统意义上的‘事件’或人物行动”（申丹，2013: 116）。这种对人物心理的重视在意识流小说中被发挥到极致。在这方面，《福楼拜的鹦鹉》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相似的气质。它分为15章，在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章等9个章节中行动几乎被摒弃，代之以福楼拜的年表、作品，以及对福楼拜的辩护和反思等内在的认知活动。

行动本身及其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直接降低了《福楼拜的鹦鹉》的故事性，并使文本趋于零散。然而，在其零散的外表下内蕴着即使现代主义文学都没有

<sup>①</sup> 文中小说引文出自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汤永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所有引文仅标注页码。

完全抛弃的“整体性”概念。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是对福楼拜的鹦鹉的追寻，只有第十三章《纯粹是故事》叙述了布雷斯韦特的真实生活。这些章节并不能孤立来看，而是互相指涉，体现出文本间性，统辖于同一个主题，并未脱离传统的“整体性”原则。在《福楼拜的鹦鹉》中，这种整体性指向的是布雷斯韦特对妻子的复杂矛盾心态。一方面，“她是备受宠爱的仅有的一个妻子。我爱她”（211）；另一方面，“我所说的一切是，她的秘密生活和她的绝望这两者都同样隐藏在我难以接近的她的内心深处”（217）。这就印证了海登·怀特所说的：“人类愿意走进当下，切实而又充分地体验它，这是其主要的冲动”（White, 1975: 347）。为了能够更加了解埃伦，布雷斯韦特曾经做出过努力：“我曾试着接近过吗？当然，我试过”（217）。然而，他的尝试并没有成功：“埃伦。我的妻子：一个我觉得我对她理解得比我理解一个死于一百年前的外国作家还少的人”（220）。“走进当下”，探究埃伦的感情世界才是布雷斯韦特真正的动机：“我爱埃伦，而我想知道那最糟的”（161）。

作为叙事的重要维度，行动阐释了动机，使其在具体的语境中得以延展和实现。布雷斯韦特的动机并没有催生出他相应的行动，即直接接触埃伦，无论是面对生前的她还是她死后的遗物。相反他选择了逃避和推延，以鹦鹉为契机将行动阐释动机的功能托付给了他所推崇的作家：“虽说她不像我，她没有轻率地专心研究一个已经去世的外国人来支撑她的生活”（216）。然而，“在任何叙事交流中，居于中间的……是发送者与接受者，从符码中吸取了什么以及（特别是）他们双方各自从自己的存储中选择出什么来为信息编码和解码”（普林斯，2015: 107）。在行动上布雷斯韦特利用他所存储的有关福楼拜作品和生平的知识来编码自身的生活体验。他的编码过程呼应了罗曼·雅各布森在论及语言符码的两种组织模式时所提出的“选择”模式（另一个为“组合”模式）。“在不同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意味着用其中一个替代其他选项”（Jakobson, 1971: 72）。“选择”模式所强调的是事物的相似性（“组合”模式强调关联性，即转喻），它对应修辞手法中的“隐喻”（Jakobson, 1971: 90）。布雷斯韦特用大部分篇幅来叙述对福楼拜的鹦鹉的探求，同时不断暗示他对埃伦感情世界的深切关怀，两者的相似性体现在对“真相”（将在下一节论及）的执着上。他在组织语言符码时偏重于“选择”模式。布雷斯韦特对福楼拜的鹦鹉的编码行为所替代和隐喻的正是他对埃伦情感世界的孜孜追求。由此，《福楼拜的鹦鹉》实际上暗含了双层的叙事结构：表层叙事是行动上对福楼拜的鹦鹉的寻求；深层叙事是心理上对埃伦感情世界的执着追寻。小说的双层叙事结构依靠雅各布森的“选择”模式连接在一起，从而强化了小说的“整体性”。

在表层叙事中,从一开始动机和行动就相互抵牾。布雷斯韦特认识到关注与作家生活有关的物品这种做法的荒诞不经:“是不是我们以为一生的遗物含有某些有助于认识的真实性的?……那些崇拜者、探索者、研究者,买下了足够填充一只沙发的头发”(3)。与想法相矛盾的是布雷斯韦特的行动,他本人就是从物品入手来展开他的计划:“我从塑像开始,是因为我整个计划就从这里开始”(2)。从出发点开始,他追寻鹦鹉进而重构福楼拜生平的行为几乎是自我欺骗。进而在第三章,布雷斯韦特以拖网为例表明了他对传记功能的怀疑:“然而,想一想他没有捕捉到的:总是大大超过这些已捕获到的”(37)。但当他在“欧罗巴旅馆”偶遇埃德·温特敦的时候他还是对温特敦所掌握的有关福楼拜的材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埃德真的发现了朱丽叶·赫伯特的一些材料了吗?我预先就开始感到强烈的占有欲”(41)。布雷斯韦特说自己不喜欢巧合:“我对偶然的巧合没有多大兴趣”(76),但当偶然性出现的时候,他并不抵触:“那原来的五十只现在只留下三只了”(250),他选择相信:“也许它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250)。这句话中的“它”指的是布雷斯韦特所要寻找的福楼拜的真正的鹦鹉。在这里另外两只鹦鹉所体现的正是“偶然的巧合”,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两只鹦鹉,而是将它们纳入了寻求范围。

“选择”模式下的表层叙事是深层叙事的隐喻和替代。这种替代是通过草蛇灰线的叙述技巧来实现的。这种技巧不仅是布雷斯韦特在第十三章以外的章节中呈现他真正的动机时所惯用的手法,更是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得以连接的节点。借助这种技巧,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互相缠绕、指涉。在以鹦鹉为切入点来审视福楼拜生平及作品的表层叙事中,有关埃伦的叙述像地下潜流一样时隐时现,直至第十三章才完全迸发出来。这种叙述有时候会显得突兀牵强,而正是这种与上下文的不协调凸显出埃伦是布雷斯韦特挥之不去但又无法克服的浓厚情节。他第一次提及自己的妻子是在第一章:“做一个大夫是我能干得好的行当。我的妻子……死了”(4)。接下来在第六章:“他从来不看她的眼睛。唔,你挑选吧。我妻子的眼睛是青蓝色的,这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92)。尽管从动机上讲,“我知道我属哪一派;我也知道我要寻找埃伦”(221)。在布雷斯韦特的叙述行为中,他的妻子的存在一直处于延异之中:“我的妻子……不,且慢,现在不提这”(132)。布雷斯韦特的闪烁其辞不仅没有掩盖和忽略他的真实动机,反而将作品的重心导向了深层叙事。

就深层叙事而言,布雷斯韦特在行动上的逃避使埃伦的感情世界一直被推迟到第十三章才逐渐展开。即使是在这一章,表层叙事也介入了深层叙事——即行动上对福楼拜生活的探究影响了他的真实动机。在第十三章中他以表层叙

事为掩饰,继续回避自己的真实动机。他引用福楼拜未完成的作品《布瓦和白居歇》来缓解他的悲痛。并求助于福楼拜写给路易丝·科莱的信来应对自己对埃伦的思念:“这封信总使我平静下来”(211)。行动与动机之间似乎一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布雷斯韦特对埃伦一直念念不忘:“可是你仍旧每日想起她”(210)。然而,即使在埃伦刚刚去世的特殊时候,他在具体的行动中还是选择福楼拜的虚构世界作为个体感情的规避机制:“现如今,我忆起埃伦的时候,我试着想起1853年袭击鲁昂的那场雹暴”(210)。作为对这种延异的回应和补偿,布雷斯韦特强调:“我将重新开始”(211),“我重新开始说”(211)。此时,他不得不直接面对记忆:妻子的不忠和自杀。这也是他对埃伦的生活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他始终没有了解埃伦的感情世界:“我们从未谈论她的秘密生活。所以我不得不虚构我能到达真实的道路”(216)。从动机上,他无法原谅妻子的不忠:“看在上帝的分上,她的生活可不是一则道德故事”(217),但同时又努力为她辩护:“她并未堕落”(219)。但在行动上,他依旧乞灵并沉湎于文学的虚构世界,企图在1872年法国文艺界对这类问题的处置方法中寻找答案。

因此,就动机与行动的关系而言,巴恩斯赓续的是由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等所塑造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即关注主人公内在的精神世界(动机)而淡化与行动有关的描述。伍尔夫“自始至终认为小说家应该把描写、探索人的欲望情感看作小说家的基本任务”(申丹,2013:198)。人物外在行动仅仅起到表现内心情感的媒介作用,“一旦失去这种表述作用,行动本身似乎变成了与小说主题无关的赘生物”(申丹,2013:200)。虽然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但《福楼拜的鹦鹉》的叙事架构并未走向极端的零散化。从内容上来说,对福楼拜鹦鹉的追寻影射了布雷斯韦特对埃伦感情世界的探求,统辖于同一个主题;从语言组织上来看,他借由雅各布森所提出的“选择”模式实现了双层叙事模式的结合,由此秉持了现代主义文学都未放弃的“整体性”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下展现了动机与行动之间关系的弱化。

## 二、弱化的影响:虚实兼备的文体气质与不可靠叙事

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冲淡了《福楼拜的鹦鹉》的叙事特征和故事性,使其不再侧重遵循时间先后顺序发展的行动(历时性),而更多地某个时间点做横向的扩展(共时性)。在第二、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等9个章节中,时间几乎隐退了,行动也因此无所依凭。

这种在共时性中的停留呼应了伍尔芙的观点：“现实中的真相与虚构中的真相是不能兼容的。现在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认为生活越来越真实，实际上它是虚构的；它存在于人的性格而非行动中”（Woolf, 1953: 234）。在生活现实与小说的关系上，詹姆斯提倡“将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个有机体。其目的之一就是……使生活与艺术互相越界，融为一体”（申丹，2013: 105）。外在的世界逐渐淡出布雷斯韦特的视野，他越来越孤立，关注自身的动机而非行动：“快乐在于想象之中，而不在于行为”（220）。他企图借助福楼拜笔下虚构的文学世界来超脱现实中的感情泥淖，实现“使生活与艺术互相越界”的目标：“我是早先想说的：也许对一个作家的爱是最纯洁的、最稳定的爱的形式。因此你对他的保卫就更为容易”（163）。这使小说同时具备了虚构与真实的文体气质。

布雷斯韦特从存在于福楼拜的想象及作品中的鹦鹉出发，以虚构的手法处理了有关福楼拜的史料。这一点从小说的真实作者朱利安·巴恩斯那里可以略窥一二。与写实相比，巴恩斯更倾向于虚构：“当你写新闻稿时，你的任务是简化这个世界并使它能够一下子为人们所理解；而当你写虚构作品时，你的任务是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世界的复杂……你能进一步展示真实情况的多个层次”（Guppy, 2001: 58）。布雷斯韦特试图践行伍尔芙所提出的“将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使现实中的真相与虚构中的真相兼容，以此来重新认识埃伦并审视自己的感情生活。虚构的叙述过程与真实的叙述材料之间形成了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功能性语境。在这种功能性语境中，行动和时间的隐退所留下的空白主要由信息的传递来填补。这种信息传递并非单纯地介绍福楼拜生平及作品，而是经过虚构作者的精心剪裁，以期达到更加真实的效果。第二章《年表》向读者传达了福楼拜生平中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例如在概述福楼拜 1880 年的生活状态时，叙述者先是表现了其生活中积极的一面：“1880 备受荣誉和广泛爱戴”（23），而后揭示了他生活中消极的一面：“1880 贫穷、孤独、筋疲力尽”（29），第四章《福楼拜的动物寓言集》则大量援引了福楼拜的作品、信件中有关动物的行文：“我是一只熊”（52）。第八章中布雷斯韦特从福楼拜作品中有关火车及铁路的描述出发来考察福楼拜与路易丝·科莱的感情故事。这种虚构的手法至第十一章发展到高潮，叙述者布雷斯韦特完全退到叙事以外：“作者在自己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他的宇宙中，他无处不在，也无处可见”（107）。他将叙事声音委托给了路易丝·科莱。这就从认知上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直接聆听男女感情中女方的自白，使文本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巴恩斯自己曾有过类似的观点：“文学是传递真相的最佳途径；

它是一个产生了宏大、优美、有序的谎言的过程。这个过程比事实的堆叠更能说明真相”(Guppy, 2001: 57)。他耽于这种虚构的手法,使不同的叙事声音更具真实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布雷斯韦特在追忆自己现实中的感情生活时,他闪烁其辞,对其冠之以虚构之名:“这纯粹是一则故事,不论你可能怎么想”(208),“我要给你讲一则纯粹的故事”(211)。不仅如此,他甚至像记流水账一样简化埃伦的生平:“她1920年出生,1940年结婚,在1942年和1946年先后生了孩子,1975年去世”(211)。海登·怀特对历史编纂的观点可以用来注解布雷斯韦特在埃伦生平上的敷衍。在怀特看来,事件序列本身并非故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这些史实纳入叙事框架。事件之间的联系并非天然自发地形成,而是历史学家反思的结果(White, 1975: 29-30)。布雷斯韦特所列举的这一系列有关埃伦的重要时间从本质上讲并未形成叙事,它只是事件序列。他甚至不能做到像总结福楼拜的生平那样去面对埃伦的生平和自己的感情生活。没有叙事做依托,他所要寻求的意义也就无从寻觅:“一个当代的叙述者犹豫不决,声称无法肯定,产生误解,敷衍塞责和出了差错的时候,事实上,读者能归结为现实被描绘得更为真实吗?”(107)因此,他将真实的生活境况反复地与福楼拜自己以及他笔下的人物做对比,希冀从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这几乎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因为从他探寻鹦鹉意义的行为中所搜求到的有关福楼拜的鹦鹉的消息无一例外,均指向意义的延异与缺席。现实的感情生活变得虚无和不可捉摸,日益虚构化:“惟一的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而绝非你自己的生活”(220)。

由此,虚构的真实化和现实的虚构化构成了《福楼拜的鹦鹉》的独特文体质气。布雷斯韦特创造了双向的反讽效果:既借虚构讽刺了现实,又借现实讽刺了虚构,从而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这呼应了本节刚开始时伍尔芙所说的:“我们认为生活越来越真实,实际上它是虚构的。”在这种虚实兼备的文体风格下,布雷斯韦特认识到:“你不能改变人性,你只能认识它”(221)。

这个认识过程是一场行动与动机上的“奥德赛”,不同的是奥德修斯完成了回归,而布雷斯韦特无论是动机上探求生活中的真实,还是行动上确定福楼拜虚构作品中的鹦鹉,其结果均在最末一章的梦境中得到暗示:“我没有梦见鹦鹉。却梦见了铁路……火车站灯光暗淡。没有一张时刻表我能看清,数字一片模糊。去哪儿都没有希望;再没有车次了;孤寂,黑暗”(241)。它既凸显出布雷斯韦特对无法企及的个体历史的追忆和缅怀,又暗示了他无所依凭的感情归属。如果说时刻表代指时间,那么车次则代表了空间。在这场认知与心理

历程中，外在的时间与空间被抽离出来，他的感情世界悬浮于一种尴尬的无所归依的“中间状态”（limbo），孤寂而又黑暗，由此引发了他的自我欺骗和不可靠叙述。布雷斯韦特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申丹，2015：82）。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二者兼而有之。就故事事实而言，他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我是诚实的，也是可靠的”（118）。然而这种自我欺骗式的“诚实”与“可靠”很快就被戳破：“我从不喝酒——那就是，我从不喝得太醉”（119）。就价值判断而言，他的不可靠叙述有时是无意的：“在这只常规然而又显得神秘的保存形式之下的、无懈可击的绿鹦鹉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到我几乎早已熟悉这位作家了。我既感动又欣悦”（8）。这种“感动和欣悦”并不是他最终的真实心理写照，很快他就见到了第二只鹦鹉：“你怎样比较两只鹦鹉呢……我最初的反应是那第二只似乎不如第一只那么真实可靠”（16）。更多的时候，他涉及价值判断的不可靠叙述是有意的：“不，我没有杀死我的妻子”（119），然而在第十三章他又说道：“那病人。埃伦……是我杀死了她”（220）。在谈及同埃伦的感情时，他也是充满矛盾的：“我爱她，我们是快乐的；我惦念她。她不爱我，我们不快乐”（209）。他无法真正理解并控制自己，也无法将动机与行动统一起来。

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的弱化降低了《福楼拜的鹦鹉》的文本权威，使其兼备虚构与真实的特点。在《福楼拜的鹦鹉》中，虚构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消融，二者的重叠与相互指涉颠覆了叙述者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地位，他同样在动机与行动的矛盾中面临迷惘，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和归属，因此他忽略行动而重视内在的精神，动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从这个角度来说，《福楼拜的鹦鹉》也遥相呼应了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反英雄倾向。

### 三、弱化的原因：记忆对行动和动机的疏离

行动与动机之间关系弱化的重要原因是在“自我”这个层面上，行动与动机不再直接关联，它们之间介入了大量涌现出来的记忆。记忆对行动和动机的疏离在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中已现端倪。伍尔芙认为：“一个人的气质禀性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他却可以选择怎样应用它。他必须是‘我’，虽然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个不同的我”（伍尔芙，2001：869）。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是不同自我的复合物，而是旨在说明意识主体发现真正自我的途径是“将一切累赘的次要之物推得远远的”（同上：869）。在尼采看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



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尼采,2000:4)。无论是《福楼拜的鹦鹉》的深层叙事中的情感记忆,还是表层叙事中对福楼拜作品的梳理与记忆,布雷斯韦特都很难对其加以拣择区分,他并没有“将一切累赘的次要之物推得远远的”,而是尽力搜罗记忆,因而无法确定真正的自我,主体也就无法实现与动机相一致的行动。

布雷斯韦特对记忆的难以拣择既源于表层叙事中他对传统传记固有局限的认识,又源于深层叙事中他对埃伦感情世界的执着探究。他将传统的传记比喻成渔网,意识到它既捕捞记忆,又会遗漏很多重要的史料:“传记作家把拖网拉起来,拣选、扔回大海、贮藏、切片以及出售等等。然而,想一想他没有捕捉到的:总是大大超过这些已捕获到的”(37)。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努力通过追寻福楼拜的鹦鹉来正视自己的感情时,“一般人声称代词特别是我(je)基本上是偶然的表达,它们缺乏对象意义,并且总是作为指号在真实的话语中运转”(德里达,2001:89)。作为指号的“自我”已然堕落为符号体系的产物,它逸出了自我意识的掌控,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非个体的系统在自我中运作,随着自我的不同功能被归结到这个系统,自我遂被消解”(Culler,1982:33)。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叙述者的动机被分配到由福楼拜的作品和生平所构成的符码体系中,他试图以这个“非个体的系统”来诠释、理解“自我”的感情世界。与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相对应,布雷斯韦特无差别涌现的记忆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表层叙事中,布雷斯韦特认识到了传统传记的缺陷,它无法囊括乔纳森·卡勒所说的复杂、非个体的符号体系:“那不是他们所建造的。那是他们所拆毁的”(145)。传统的传记既有建设性,又具有破坏性。对这种破坏性的担忧促使被纳入这个复杂符号体系的“自我”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回溯记忆、构建个体历史,从而钩沉其难以企及的感情脉络。这种努力反映在表层叙事中主要表现为对福楼拜生平中在场与不在场这两个方面的还原,即“所建造的”和“所拆毁的”。就在场而言,他以鹦鹉为切入点,试图从多个角度还原真实的福楼拜。在第二章中他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勾勒了福楼拜的生平。在第四章中他从动物寓言的角度分析了福楼拜的性格。第六、第十章中则是评论家眼中的福楼拜。同时,他将福楼拜的叙述委托给多元化的叙述声音,包括福楼拜自己、他的外甥女、他的母亲、迪康、路易丝·科莱等多个人物在内。就不在场而言,布雷斯韦特始终对传统传记遗漏的部分耿耿于怀:“那不是存在的街道。那是已不再存在的街道”(145)。因此在第九章中,他一厢情愿地从福楼拜自己的信件中构建了福楼拜生平中不在场的部分。其不在场的部分既包括福楼拜向往但未写出的

作品——自传、译作和虚构小说等，也包括他没有实践过的生活：“到二十五岁他有意想做个婆罗门”（156），“二十九岁受到洪堡的感召，他想离去，到南美洲……”（157）布雷斯韦特对福楼拜向往但未实现的生活的关注源于他面对个体历史时的无奈：“我们知道的不是生活。……那也是没有生活过的生活”（154）。他无法正视记忆——妻子的不忠，想象着回溯到过去，去选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从而使生活有一个迥异的结果：“我们是否也该为失去这样一个结尾而叹息？”（148）

在深层叙事中，从动机上讲，布雷斯韦特对埃伦的深厚感情及埃伦的不忠使他无法舍弃记忆的任何细枝末节。从行动上讲，作为深层叙事的隐喻，这种夹杂了福楼拜生平中在场与不在场部分的表层叙事却并没有帮助布雷斯韦特还原记忆、确定感情归属，而是适得其反，使他陷入了符号体系的旋涡：“你要一只鹦鹉吗？他们说。那么我们上鸟类藏品区去。他们打开了门，于是他们在前面见到它们……五十只鹦鹉”（247）。动机与行动之间介入了无差别涌现出来的记忆，既包括个体记忆，又包括他对福楼拜生平的记忆。这些记忆像影子一样紧随在布雷斯韦特的身后：“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尼采，2000：1）。那些记忆重压着他，形成了他所谓的“黑暗的深渊”：“而如果你理解凝视脚下黑暗的深渊能使人平静，那么你就不会跳进深渊。或许这正是埃伦的弱点：缺乏一种凝视黑暗深渊的能力”（238）。

实际上，布雷斯韦特也缺乏这样一种凝视黑暗深渊的能力。换言之，深陷符号之网的他无法通过拣择记忆来对复杂的符号体系加以简化，也即无法遗忘。

“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尼采，2000：3）。在复杂的符号体系映衬下的个体记忆因为布雷斯韦特执着地寻求和铭记反而变得驳杂和模糊，作为行动指南中的重要一环，叙事者的“个体记忆”失去了确定主体身份和归属的功能，因而无法在“不同的我”中确定真正的自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而是相信“快感先是在预期中找到，随后在记忆中觅得”（220）。但是，这种无差别涌现出来的记忆却是一种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尼采，2000：3）。同样地，布雷斯韦特“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借助福楼拜的鹦鹉来理解自己的感情世界，这使他深深陷入复杂的符号体系之中，叙事主体的真正动机分散给了乔纳森·卡勒所说的已经介入自我的“非个体系

统”。布雷斯韦特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其动机本来应该产生的行动，由此，无差别涌现的记忆弱化了叙事者的动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布雷斯韦特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我们该怎样抓住过去？它能让人看清楚吗？有人这样想。我们懂得更多些，我们发现额外的文件……因此，我们理解得更透彻。是那样吗？我怀疑”（124）。

## 结语

《福楼拜的鹦鹉》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处理了现代主义的议题——行动、动机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在个体生活体验趋向零散及去中心化的当下，小说的虚构作者布雷斯韦特仍执着地通过确定福楼拜笔下的鹦鹉来解开生活和感情中的谜团，却在自我欺骗中陷入了符号体系的旋涡，无法实现与动机相一致的行动。从主题来看，《福楼拜的鹦鹉》虚实兼备的文体气质承袭了詹姆斯“将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它采用虚构手法揭示出理智的行动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浅层表现，行动受到记忆的规约与干扰，不一定是动机的有效延展。行动不仅存在若干可能的发展趋势，有时候甚至会阻遏动机的实现。从文学传统来看，《福楼拜的鹦鹉》淡化行动的手法同詹姆斯和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思路相呼应。它甚至暗合了尼采有关“记忆”的思想。因此，《福楼拜的鹦鹉》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向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

## 参考文献：

- [1] Barnes, Julian. Double bind [J].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82, 4 (10): 22, 24.
- [2] Barnes, Julian. The follies of writer worship [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85 (1): 16-17.
- [3] Culler, Jonathan. *The Pursuit of Signs* [M]. Ithaca: Cornell UP, 1982.
- [4] Guppy, S. The art of fiction CLXV [J]. *The Paris Review*, 2001 (157): 54-84.
- [5] Jakobson, Roma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A]. In 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 (Eds.).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C]. The Hague: Mouton, 1971: 67-96.
- [6] Lutzeler, Paul Michael. Fictionality i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novel [A]. In Ann Fehn, Ingeborg Hoesterey & Maria Tatar (Eds.). *Never Ending Stories: Toward a Critical Narratology* [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44.
- [7]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作者信息:** 王玉芒,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300300, 研究方向: 英国文学。电子邮箱: byronbyron@126.com  
谭敏,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300300, 研究方向: 英国文学。

## 本刊声明

1. 本刊所发作品仅为作者观点, 不代表编委会或编辑部的立场。
2. 欢迎对本刊所登文章开展学术讨论。
3. 本刊对所发作品享有中文专有出版权, 请勿一稿多投。
4. 欢迎转载本刊文章, 并按规定付酬及注明出处。
5. 本刊对来稿保留修改权, 有特殊要求者, 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所发论文享有汇编权、翻译权、电子出版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权, 所支付费用合并在稿费中发放, 如有异议, 请事先声明。

##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Place” in Seamus Heaney’s Poetry**

ZHAO Yanjiao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lace or regional domain in Seamus Heaney’s poetry implies more than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at merely arouse people’s sentimentality. It serves as a vital stimulant for the poet’s novel imagination and philosophical emigration to the realm of the mind concerning the issues of Irish cultural inheritance, through which Heaney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hen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As a poet, Heaney has strengthened the expressiveness by supplying diverse tangible places at which he uncovers traces of the Irish heritage and origin to his poetry creation, satisfying the need to reconsider the artist’s identity within his familiar territory. Heaney supplies different actual territorial places or regions to his poetry in order to unravel Irishness and arouse people’s memory of Irish nationality, meanwhile, he is capable of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territorial places of the homeland country, the place of poetry, the place of the poet and even the artist in society. Based on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Heaney’s sense of place from his three main poems, namely, “Digging”, “The Tollund Man” and “Station Island XII”, with an aim to reinforce the notion that the poet should keep a neutral attitude and take a middle stance when social obligations and artistic pursuit are in conflict, and bear the poetic responsibility of devo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introspective traits of literary conscience in a much broader sense.

**Keywords:** Seamus Heaney; concept of place; artistic pursuit; literary conscience